

陈元胜 著

诗 经 辨 读

国 风 小 赋

安徽大学出版社



中国文学多维研究丛书

诗经辨读

(国风小赋)

陈元胜 著

安徽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合肥市肥西路3号 邮码230039)

铁四局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2.75 字数 320 千

1998年12月第1版 1998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2000 册

丛书策划 朱志荣 责任编辑 秦野 封面设计 孟献辉

ISBN 7-81052-215-9/I·19 定价 19.5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诗经辨读》总序

黄天骥

陈元胜先生专著《诗经辨读》即将出版，嘱为之序。我虽对《诗经》没有作过深入的研究，但颇知著述的甘苦，也佩服陈先生锲而不舍的研究精神，遂欣然从命。

我记得50年代初在中山大学求学的时候，第一个学期修读中国文学史，首先碰到的课程，就是《诗经》。当时，授课的詹安泰教授，一板一眼地吟哦，他对《诗经》鞭辟入里的分析，引起我强烈的兴趣。我跑到图书馆，把方玉润、姚际恒、崔述诸人有关《诗经》的著述，借过来乱读一气。不久，李长之、余冠英、高亨等先生有关《诗经》译注的文字相继出版，而詹安泰老师在《人民文学》杂志上，又发表了建国后第一篇力图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研究《诗经》的学术论文。这一来，我对《诗经》的学习兴趣就更大了。整整一个学期，除了听课以外，我把全部学习时间投放在研读《诗经》之中。有时读得专心，错过了膳堂开饭时间，便只好念着“彼君子兮，不素飧兮”，胡乱买些零食填肚。真是越读越入迷，越入迷越读。谁知道，过了不久，校里开展对“白专道路”和“学习偏废”的批判，我很自然地当了靶子，幸而这属于内部矛盾云云，算不上“挨整”，只要检讨检讨，便可蒙混过关。所以“检讨”尽管要写，《诗经》还是照读。粤谚云“麻油拌韭菜，各有各所爱”，我是顾不了许多的。

其实，回过头来看，当初我比较认真地研读《诗经》，这对后来从事古代文学的教学科研工作，是有莫大的好处的。因为《诗经》

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要了解中国文化、文学的发展，必须追源溯流。所以对《诗经》作比较深入的学习，实际上为进一步研究中国文化、文学问题，打下坚实的基础。而且，把《诗经》各类笺释、各类资料、各家说法，拿来细细比较，这不仅在不知不觉得掌握了训诂方法，加强了阅读古代汉语的能力，也初步懂得了进行科学的研究的入门方法。当然，在当时，我也并不懂得这许多道理，只是歪打正着，无意中从《诗经》的研读中获得了益处。也正因如此，我对《诗经》始终是怀着一种特殊的感情的。

我从自己所走过的路，体会到从《诗经》入手研究学问的作用。我也很愿意向有志于提高文化、文学修养的读者建议，把研读《诗经》作为进修的基本功。一旦对这比较艰深而又有趣的课题掌握住了，便能事半功倍、势如破竹进入古代文学和文化领域。当然，对初学者来说，特别是对一些不容易找到图书资料的读者来说，如何正确理解《诗经》，会碰到许多问题。自汉以来，有关研究《诗经》的典籍，汗牛充栋，而且诸家意见纷纭，读者要一一爬梳比较，作出判断，从而顺利地阅读理解，是颇费周章的。现在，陈元胜先生《诗经辨读》的出版，正好为读者提供了方便。

前几年，也就是陈先生潜心研究《诗经》的时候，学术界曾出现过一阵“方法热”，有些学者，热衷于把这个“论”、那个“论”，套用到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上。这样做，不能说完全没有用处，但容易游谈无根，有空疏不实之嫌。其实，要研究古代文学，特别是研究像《诗经》这类需要大量训诂工夫的学问，不首先从弄清楚作品每字每句的涵义做起，那就很可能把结论建立在流沙之上。在“热”气腾腾的时候，我很欣赏陈元胜先生能坚持扎实的学风。我也曾拜读过他在前几年写成的《诗品辨读》一书，该书考索精审，条分缕析地帮助读者弄清楚《诗品》的疑难问题。这种严肃的治学精神，当年颇有“顶风”的意味。继此之后，陈元胜先生又完成了《诗经辨

读》。两部书,既可说是姊妹篇,也可说是著者求实求真治学作风的前后辉映。

目前,据我所知,学界对《诗经》的研究,是有新的进展的,特别是一些年青的学者,敏锐地从文化的角度,重新审视《诗经》的价值;也发现许多过去视为定论,其实是大可商榷的问题。而在《诗经》研究热潮逐步深入的时候,很有必要出版像《诗经辨读》这样在训诂方面工力较深的著作,作为提供普及阅读和进一步探索的文本。

《诗经辨读》,着眼于辨。陈元胜先生搜罗众书,辨释众说;或择善而从,或另辟新义,于是写成一篇篇辨读的文字。他的许多工作,属于微观研究范围,我赞成陈先生在这方面狠下工夫。梁启超说:“论事必举证”,“证备然后自表其所信”。这种意见,在今天还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然而,《诗经辨读》一书,又不同于一般的《诗经》作品分析或者译注。著者力求在透彻研究《诗经》每章的基础上,揭示《诗经》乃至古代文学研究许多共同性的难题,把宏观审视和微观体察融为一体。清代乾嘉学派,注意比勘和字句的考证,在微观体察方面有所贡献,但他们不能把一个个琐细的考察所得,通过推理分析、综合整理,作出更深更广的研究。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这就存在很大的局限性。陈元胜先生的《诗经辨读》,既努力弄清每字每句的真相,又注意对《诗经》作综合性的研讨,从而写成了一篇篇的学术专论,引导读者高屋建瓴地观察审视,在推进《诗经》的整体研究方面,陈先生也做出了可观的贡献。

陈元胜先生和我,虽然同在广州,但大都市交通拥挤,来往不便,我还未能向他认真求教。这次有机会看到他的研究成果,很为他高兴。我知道广东民族学院远在市郊,搜集图书资料有诸多的不便。南方夏天的时间又长,聚蚊成雷,挥汗如雨,坚持伏案爬梳

古籍，滋味并不好受；何况商品经济大潮，彼伏此起，崩崖裂岸。学术界的人士中，经不起诱惑相率下“海”者有之，经不起冲击嗒然若丧者有之。不过，广州却不是文化沙漠，岭南文化从来以其广大的包容性独树一帜。我认识不少像陈元胜先生这样的学者，都在克服种种困难，孜孜不倦穷年兀兀地工作。他们甘坐冷板凳，倒不是自慰“君子固穷”，而更多是出于对民族文化的热爱，出于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今天，人们对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有越来越深的认识，当会更理解认真整理古籍弘扬中华文化传统的意义。我也相信，陈元胜先生正当盛年，一定能再接再厉，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中作出更多的成绩。

1996年11月于中山大学

[著者附言]

黄天骥先生，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山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现为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学遗产》通讯编委。黄先生在百忙之中，访问日本国汉学界归来后，为拙著作序。《国风小赋辨读》乃《诗经辨读》之一，兹冠以黄先生的“总序”。有了这篇“总序”，可免去著者为本书撰写“前言”或“后记”之劳。特此鸣谢！

例 言

一、《诗经》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研究著作，前人释注甚多，汗牛充栋。在宋代之前，汉学说《诗》以《毛传》、《毛序》、《郑笺》、《孔疏》为藩篱，用封建的儒家思想来说诗，陈陈相因，具其说经的权威性。其实，《诗》历经秦始皇焚书坑儒之浩劫，虽以“讽诵不赖竹帛”流传下来，其“真相”却已隐藏不见。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绪言》说：“史家的责任是求‘事实的历史’之真，但‘事实的历史’之真却往往隐藏不见。”《诗》的真相隐藏不见，同样大体可归纳为“原始的隐藏”与“意识的隐藏”两种方式。前者由于史料的缺陷，后者实乃说《诗》家们的“成见”。宋代学者始怀疑儒家说《诗》经学的权威性。然而，综观《诗经》研究的历史，可以说迄今距《诗》“真相”的完全揭示，差距甚远。宋儒的《诗经》学研究并未能跳出《毛序》、《毛传》的桎梏，因袭旧说之处甚多，所谓“时复阳违之而阴从之”（姚际恒《诗经通论》语）。宋代以后，尊《毛序》或崇朱熹，一直是说《诗》聚讼纷争的中心。清代考据学大兴，排斥宋学的空疏，复兴汉学旧传统。本世纪 20 年代，著名学者郑振铎说：“我们要研究《诗经》，便非先使这一切压盖在《诗经》上面的重重叠叠的注疏、集传的瓦砾，爬扫开来，而另起炉灶不可。这种传袭的《诗经》注疏如不爬扫干净，《诗经》的真相便永远不能显露。”（《读毛诗序》，载《小说月报》1927 年《中国文学研究专号》）几十年又逝去，在世纪之交的今天，“爬扫开来而另起炉灶”的研究工作进展如何，

“诗三百”的真相显露几许？有鉴于斯，而著《诗经辨读》。《国风小赋》是其一。

二、全面系统地综合辨读“诗三百”，势必有助于《诗》真相的显露与揭示。实际上，这种系统的综合辨读，乃古籍整理与研究有待开拓的新领域。楚辞研究专家游国恩说：“昔人好说楚辞，其书殆不下数十百种，大率习旧安常，浅薄固陋；往复其言，互为奴主，而多不肯深致其功。”（《离骚纂义·总序》）可见，楚辞方面亦有待于系统的综合辨读。拙著《诗品辨读》（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初版），则是对钟嵘《诗品》系统的综合辨读。至于“诗三百”的辨读，前人并非忽略无为，惟其实非系统的综合辨读。朱熹《诗集传》释注《卫风·芄兰》云：“此诗不知所谓，不敢强解。”其实，他已为之释注。如此“集传”当然谈不上是“辨读”。姚际恒《诗经通论》留意“辨别前说，以从其是而黜其非”，却只是着重辨别诗篇题旨，缺乏文字训诂诸方面综合辨读，且往往是不赞成前人的说法，也没有新见，以“不得其解”存疑。至如今人说《诗》，存异说固可，然不加分辨，诗篇“真相”隐藏，读者亦茫然。因此，系统的综合辨读，既有助于《诗》真相的揭示，又有裨益于古典文学，包括文学史、古文论、文学批评史诸方面的深入研究。

三、宏观审视与微观体察融为一体，实乃本书奉行的辨读宗旨与研究方法。具体落实在两大方面：其一，逐篇辨读，揭示诗篇真相；其二，学术专论，解决《诗》学乃至古典文学研究诸疑难课题。

四、逐篇辨读，揭示“真相”。每篇辨读，由译诗、辨释两部分构成。译诗注重把原篇章内容与表达形式都准确释译出来，力求准确流畅，有诗的韵味。原诗句长短参差不齐者，译诗亦如之。辨释部分，先列出诗篇题旨，再辨释章句，最后辨明题旨兼及诗篇特色。袁珂《山海经校译·序》说：“历代注家虽然都各尽其力，对这书作了或详或略的注释，但是我敢相信，他们中也没有一个能够完全彻底

地了解这部书。遇到困难不解处，态度老实的，就只好坦白承认‘所未详也’，如像晋代的郭璞。”自东晋郭璞而下的《山海经》注家，坦承“未详”的态度不见了，“要不就略而不论，要不就强为之说”。历来《诗经》释译，亦有类似情形。本书遵循“为学譬如积薪，后来居上”的自然法则，既尽量利用历代注家的成果，又不回避难解之处。对“诗三百”原篇章，历来有疑阙或争议之处，既不“略而不论”，更不“强为之说”，力求“辨释”清楚。每篇“辨释”稿，著者视为学术论文来操作。虽然“工程”浩大，颇费斟酌，费时费力，却能免去“注释”之繁琐，又势必对诗篇真相的揭示大有裨益。

五、学术专论，解决疑难课题。例如：揭示“六诗”真相，探索汉赋源流，实为解开《诗》学研究、中国诗歌发展史研究乃至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一系列疑案之谜底。汉赋渊源，由于文献材料的匮乏以及研究过程中各种因素的影响，迄今未能论定。全面系统地综合考察《国风》里的赋篇，有助于揭示“赋者古诗之流”的谜底。《国风》小赋实乃探索汉赋渊源之丰富的文献材料。然而，文学史家们历来或视而不见，或缺乏作出全面考察。本书逐篇辨读《国风》百六十篇后，欣喜地看到赋篇数目过半。《国风》小赋凡八十六篇，是为本书篇目。逐篇辨读之后，有学术专论两篇：（一）《国风》小赋论；（二）“六诗”辨说。

六、立足《诗经》文本，探索《国风》小赋。本书学术专论所解决的疑难课题，倘若没有本书逐篇辨读的研究成果，是无法找寻到答案的。

七、本书辨释部分，涉及古今众说，只标明“或曰”、“或译为”，不一一注明所出书名；有的则用简称，如：毛传、毛序、郑笺、孔疏。今人著作，如高亨《诗经今注》、金启华《诗经全译》、杨任之《诗经今译今注》等，均可供读者参阅，恕不一一列出。

八、本书力求雅俗共赏：既有较普遍的可读性，又有较高的学

术价值。既为中国古典文学名著《诗经》的普及阅读与深入研究提供实用的读本，又给中国文学发展史、文学理论、文学批评诸研究领域贡献出学术研究成果。冀海内外方家、广大读者惠览并教正之！

目 次

《诗经辨读》总序(黄天骥).....	(1)
例 言.....	(5)
周南辨读.....	(1)
葛覃(1) 卷耳(7) 荞苼(11)	
召南辨读.....	(15)
采繁(15) 采蘋(18) 甘棠(21) 羔羊(24)	
摽有梅(29) 小星(32) 野有死麕(35) 驴虞(40)	
邶风辨读.....	(45)
日月(45) 击鼓(49) 式微(54) 旄丘(57) 简兮(59)	
泉水(63) 北门(68) 静女(71) 二子乘舟(75)	
鄘风辨读.....	(80)
君子偕老(80) 桑中(85) 定之方中(90) 干旄(96)	
载驰(100)	
卫风辨读.....	(106)
考槃(106) 硕人(110) 岷(117) 竹竿(126)	
河广(130)	
王风辨读.....	(133)
黍离(133) 君子于役(138) 君子阳阳(141)	
采葛(146) 大车(149) 丘中有麻(153)	
郑风辨读.....	(158)
缁衣(158) 将仲子(161) 叔于田(166) 乘乘马(168)	
清人(173) 羔裘(177) 遵大路(179) 女曰鸡鸣(182)	

有女同车(188)	狡童(192)	褰裳(194)	丰(197)
东门之墠(200)	风雨(203)	子衿(206)	
出其东门(209)	野有蔓草(211)	溱洧(214)	
齐风辨读			(219)
鸡鸣(219)	还(222)	著(225)	东方之日(228)
东方未明(232)	卢令(235)	载驱(238)	猗嗟(242)
魏风辨读			(247)
陟岵(247)	十亩之间(250)	伐檀(253)	
唐风辨读			(260)
蟋蟀(260)	羔裘(264)	无衣(266)	
秦风辨读			(270)
驷驖(270)	小戎(275)	蒹葭(282)	无衣(287)
渭阳(291)	权舆(293)		
陈风辨读			(297)
宛丘(297)	东门之枌(300)	衡门(303)	
东门之杨(307)	株林(310)		
桧风辨读			(314)
羔裘(314)	素冠(316)	隰有苌楚(319)	匪风(322)
豳风辨读			(326)
七月(326)	东山(340)	破斧(346)	
学术专论			(351)
《国风》小赋论			
——兼论汉赋的渊源流变			(351)
“六诗”辨说			(376)

周南辨读

葛 覃

葛之覃兮，
施于中谷，
维叶萋萋。
黄鸟于飞，
集于灌木，
其鸣喈喈。

葛藤如此蔓延呵，
蔓延在那山谷中，
只见叶子绿茫茫
黄鹂鸟儿在飞翔，
聚集在那灌木丛，
和鸣喈喈传远空。

葛之覃兮，
施于中谷，
维叶莫莫。
是刈是濩，
为絺为绤，
服之无斁。

葛藤如此蔓延呵，
蔓延在那山谷中，
只见叶子青茫茫。
割取葛藤煮葛藤，
织成细布织粗布，
穿上葛布可舒服。

言告师氏，
言告言归。
薄污我私，
薄浣我衣。
害浣害否？
归宁父母。

就要向师氏告假，
告假后就要回家。
急忙换洗我内衫，
急忙洗濯我衣裳。
哪件要洗哪件穿？
回家给父母问安。

【辨 释】

刈葛小赋：葛藤蔓延山谷中，一派丰收景象；割取葛藤的人们赋此以诵之。

首章先叙葛藤蔓延山谷中：“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萋萋。”葛，葛藤，豆科藤本植物，茎皮纤维可织葛布。之，此，如此。覃，毛传曰“延也”，即“蔓延”。施，移，亦“蔓延”义。中谷，谷中。萋萋，茂盛的样子。“葛之覃兮”的“之”字，历来多不加辨明。或译为“葛儿呀，长又长”；或译为“葛麻蔓延起来”；或译为“长长的葛藤”。凡此种种，皆未能明辨“之”字的用法；所谓“长长的葛藤”，显然是把“之”解为“的”字。其实，《诗经》中的这类“之”字，用在主语与谓语之间，作“此(如此)”解。《郑风·丰》“子之丰兮”、“子之昌兮”；《齐风·还》“子之还兮”、“子之茂兮”、“子之昌兮”；《卫风·考槃》“硕人之宽”、“硕人之莲”、“硕人之轴”；《鄘风·君子偕老》“子之不淑”，皆是其例。先秦以后的古汉语，“此”尚可单用作“如此”讲，如庾信《哀江南赋》：“以翦首而赐秦，天何为而此醉！”(如此昏醉)参见《丰》、《还》、《考槃》、《君子偕老》诸篇有关辨读。葛藤如此蔓延呵，蔓延在那山谷中，只见叶子绿茫茫。好一派葛藤茂盛丰收的景象！黄鹂鸟儿成群飞翔、和鸣，更增添欢快的气氛：“黄鸟于飞，集于灌木，其鸣喈喈。”黄鸟，黄鹂；《尔雅·释鸟》：“皇，黄鸟。”晋郭璞注：“俗呼黄离留，亦名抟黍。”毛传即释为“抟黍”。黄鹂乃应节趋时之鸟，常在桑葚熟时成群来在桑间，俚语曰“黄粟留看我麦黄葚熟”即谓此。葛藤丰收季节，正当黄鹂聚集和鸣之时，故有“黄鸟于飞”之赋。灌木，丛木。喈喈，和喈声远闻。黄鹂鸟儿在飞翔，聚集在那灌木丛，和鸣喈喈传远空。首章先叙葛藤蔓延山谷中，极力渲染丰收的景象，绘色绘声，此亦割取葛藤的劳动者们所见所闻矣。

次章开头复沓赋之：“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莫莫。”三句之中，仅将首章“萋萋”二字，变换为“莫莫”。《广雅》：“莫莫，茂也。”

萋萋、莫莫，皆言“茂盛”、“茂密”。葛藤丰收，刈者欢快地收割，并由此联想到煮取葛藤纤维、织成葛布穿在身上可舒服：“是刈是濩，为缫为绤，服之无斁。”刈，割取。濩，煮。《国语·齐语》“挟其枪刈耨镈”，韦注：“刈，镰也”。可知“刈”原为收割的工具，用刈以取，故训刈为“割取”。濩，镬之假借，《仪礼·少牢馈食礼》有羊镬、豕镬；镬乃煮食的器具，故亦训镬（濩）为“煮”。缫，细葛布。绤，粗葛布。服，服用，即“穿上”。斁，厌。郑笺：“服，整也。”把“服”字当成“艮”之假借字。《说文》：“艮，治也。”治即“整”。把“服之无斁”释为“治之无厌”，显然不合诗意。既言“为缫为绤”，整治之功已言明，何来“整治”又“无厌”之有？《魏风·葛履》“好人服之”，服即“服用”义。无厌（无斁）者，舒服也。割取葛藤煮葛藤，织成细布织粗布，穿上葛布可舒服。刈者的联想，令割取葛藤的劳动增添了欢快的气氛。

末章叙劳动后向“师氏”告假，就要回家给父母问安：“言告师氏，言告言归。薄污我私，薄浣我衣。害浣害否？归宁父母。”言，爰，于是（就）。《邶风·击鼓》：“爰居爰处，爰丧其马。”——句式相同。师氏，官积之称，《周礼·地官司徒》记载：师氏掌教“国子”，率所属守卫宫门。历来不辨“师氏”之职，致使诗篇中割取葛藤的“刈者”为谁人，众说纷纭。而只有弄清楚“刈者”是些什么人，诗篇题旨始得辨明。详下辨之。归，回家。薄，急忙。《周南·芣苢》“薄言采之”，薄即“迫”，“急忙”义。参见《芣苢》辨读。污，烦，劳事，此指“换洗”之事，故曰“薄污我私”。私，袒服。《玉篇》：“袒服，近身衣也，日日所著衣。”即“内衣”。或曰：“污，烦搊之以去其污，犹治乱而曰乱也。”或曰：“污，搓揉去污。”或曰：“汙（污的异体字），泡在水里。私，疑借为菘，白茅的穗名菘，洁白柔滑，用它洗衣可以去油垢，与皂角的作用相同。”或译为“快清理我的内衣”；或译为“洗洗我的内衣”；或译为“呵，洗涤我内衣”。其实，“去污”或“泡菘”（白茅穗）之说，并无根据。《左传·昭公元年》“处不辟污”，杜预注云：

“污，劳事。”诗章“薄污我私”句，毛传云：“污，烦也。”烦与劳同义；烦劳之事谓之“污”。诗章正是用“污”字指“换洗”内衣之烦劳事。既言“急忙换洗我内衫”，又紧接着说“薄浣我衣”。浣，洗濯。衣，衣裳。害，曷、何。哪件要洗哪件穿？穿上干净的衣裳以“归宁父母”。宁，安，归宁即“回家问安”。

诗篇题旨，毛序云：“《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则志在于女功之事，躬俭节用，服浣濯之衣，尊敬师傅，则可以归安父母，化天下以妇道也。”自毛序倡“后妃”说，历来说诗者皆跳不出“刈葛者”为“后妃”或女子之窠臼。或曰：“此诗后妃所自作，故无赞美之词。然于此可以见其已贵而能勤，已富而能俭，已长而敬不弛于师傅，已嫁而孝不衰于父母，是皆德之厚而人所难也。小序以为后妃之本，庶几近之。”或曰：“这首诗反映了贵族家中的女奴们给贵族割葛、煮葛、织布及告假洗衣回家等一段生活情况。”或曰：“这是一篇写新婚之妇归宁省亲的诗，并赞扬其勤劳恭谨。”或曰：“这是一个随军妇女的歌。她采集葛藤，制作衣衫，洗洗涮涮，忙个不停，然后请假回家探望父母。”或曰：“当是描写文王时代公社的姑娘们种葛覃，获得丰收，又织布制衣的集体劳动生活之诗。”有关诗章的种种臆断，姚际恒《诗经通论》已有所察觉，其云：“小序谓‘后妃之本’，此‘本’字甚鹘突。故大序以为‘在父母家’，此误循‘本’字为说也。按诗曰‘归宁’，岂得谓其在父母家乎！……《集传》不用其说，良是。然又谓‘小序以为后妃之本，庶几近之’，不可解。《集传》云，‘此诗后妃所自作’，殊武断。”姚氏对历来解说《葛覃》篇之“纷然摹拟”，作了尖锐的批评，其云：“此篇解者有重‘治葛’者，有重‘归宁’者。按重治葛，则遗末章之义；重归宁，尤谬。妇人归宁，乃事之常，此何足见后妃之贤而咏之乎！又多作治葛甫毕，即图归宁，以是联络上下，尤滞。说得后妃如小家妇相似，毫无意义。故解此篇者，于首章或谓后妃治缔络既成，追叙初夏，或谓

黄鸟鸣动女工之思；于末章或谓洁清以事君子，或谓已嫁而孝不衰于父母，或谓勤于女工原是父母之教，或谓尊敬师傅：皆同呓语。”然而，姚氏仍然未能跳出“后妃”说之窠臼。他认为：“此亦诗人指后妃治葛之事而咏之，以见后妃富贵不忘勤俭也。上二章言其勤，末章言其俭。首章叙葛之始生，次章叙后妃治葛为服，末章因治服而及其服浣濯之衣焉。凡妇人出行，必洁其衣，故借归宁言之。”显然，所谓“末章言其俭”，实属臆断；视“言告师氏，言告言归”二句而不见，强为之说。姚际恒《诗经通论》与朱熹《诗集传》，同视首章为“赋”，不用毛传“兴也”之说，这是姚、朱二位说诗者高明之处。不过，他们均因循毛传“师，女师也”旧解，不辨“师氏”之职，终未能摆脱毛序“后妃”之说。

考察《周礼》，有“师氏”官职；简称“师”，西周金文中常见。春秋时各国多称乐官为师，西周金文则称乐官为“辅师”（铸师）。春秋战国时，各国国君的师傅亦称“师”或“傅”。担任教导贵族子弟的官，有“师”有“保”，统称“师保”。《礼记·文王世子》：“师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辅翼之而归诸道者也。”古籍中并无所谓“女师”的记载。毛传为圆其“后妃”说，强释“师”为“女师”；后人“纷然摹拟”，以致今人或译为“阿妈”、“姆姆”。闻一多就说：“女师之职，略同奴婢，特以其年事长而明于妇道，故尊之曰师，亲之曰姆。”他认为：“姆，即师氏……论其性质，直今佣妇之事耳。”（参见闻一多《诗经通义》）可见，不弄清楚“师氏”之职，则无以辨明诗篇题旨。查《周礼·地官司徒》：“师氏，掌以媿诏王，以三德教国子。一曰至德，以为道本；二曰敏德，以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恶。教三行：一曰孝行，以亲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贤良；三曰顺行，以事师长……凡国之贵遊子弟学焉……使其属帅四夷之隶，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门外，且跸。朝在野外，则守内列。”师氏掌教“国子”而外，还负责派官员率兵守宫门，负有“凡祭祀、宾客、会同、